

# 论吕留良形象的文学差异

## ——以《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为中心

刘韵鸥<sup>1</sup>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涉及吕留良的文学形象描写大相径庭。作者选择吕留良案件为文学材料的动机不同,其间接原因是纪昀“法严考辨”与袁枚“性灵自由”的对立,直接原因则是纪昀奉君于朝与袁枚夷旷在野的差异。这背后显示了在朝集团与在野之士之间的张力:《子不语》中袁枚是为士人群体发声,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则是为皇权话语正名。吕留良文学形象的分裂,代表了两人立场的根本不同。

**【关键词】:** 吕留良 文学形象 差异 《子不语》 《阅微草堂笔记》

**【中图分类号】:**B24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19)04-0088-06

关于明末清初浙江大儒吕留良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果。<sup>①</sup>不过,与对吕留良理学文化、时文点评、政治思想的研究相比,对其在文学生态圈里的研究则还比较薄弱。特别是关于吕留良在不同文学文本之间的互动研究与文学形象建构的差异性表达,就更是一个崭新的议题。本文从吕留良作古之后出现的《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这两本笔记小说入手,比照已知史料,追踪吕留良大案留存的相关文学线索,其中包括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以及诗文总集,从而寻找一个更为开阔多元的观察视角,诠释吕留良文学形象的差异性。

### 一、选择吕留良案件为文学材料的不同动机

吕留良案件在清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要探讨纪昀与袁枚选择以吕留良案件为文学素材来进行相关文言小说创作的深层动机,则绕不过雍正对吕留良的态度。雍正主要从儒家经典中提出论据对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加以反驳。最为明显的就是,雍正帝在诏谕里对吕留良引以为傲的理学道统提出质疑:像周、程、张、朱这样的鸿儒是不会有吕留良这样的贼子门徒。因为吕留良在著述中多次模糊清廷的称谓,以此抗拒王朝归属,“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一大统之义。平日之谓我朝,皆任意指名,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sup>[1]16</sup>。雍正还认为,吕留良更为罪大恶极的是以疆域藩王“兵连祸结为幸”,“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人人得而诛之。吕留良闻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不顾纲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为心;不顾生民之涂炭,惟以兵连祸结为幸。何吕留良处心积虑,残忍凶暴之至此极也。”<sup>[1]16</sup>

除此之外,雍正也提到了吕留良“污蔑”“康熙甚吝”:<sup>②</sup>“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除水旱赈恤外,特恩蠲免钱粮不下数百万石,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岂吝主所能为者?吕留良独无耳目乎?忍心害理,可谓极矣。且吕留良谊属臣民,而漫称康熙,其悖逆无状,何太甚矣。即此数条,倡狂悖乱,已极放言横逆之罪,况其他太甚之词,尤足令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sup>[1]18</sup>。

在雍正看来,如果曾静只是冥顽无知受人蛊惑,那么吕留良就是那个热衷于给人下蛊的邪恶巫师。吕留良在浙江一带享有盛

**作者简介:**刘韵鸥(1995—),女,重庆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名,坐拥巨资,乡人转相推服,转相慕效,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乃至地方官吏也不得不向吕留良这样的“地头蛇”低头,一上任便要赠送匾额以示尊敬。“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势之器凌,党徒之众盛,皆须加意周旋,优礼矜式,以沽重儒之誉。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公正刚直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照往例,不得不为之赠送祠堂扁额,况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溺乱世俗,害已不可胜言矣。”<sup>[1]19</sup>

在清代“白色恐怖”高压下,时人多以鬼喻人,在志怪小说里寄托其对现实生活的诉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评价袁枚《子不语》为“文凭去雕饰,反近自然”的带有率意性质的志怪小说,评价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则是“立法甚严,博辨宏通”<sup>[2]137</sup>。即使袁枚、纪昀作品的风格迥异,但无论是他们的创作还是他们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透露出对于吕留良案件的真实看法。

在纪昀看来,吕留良在世时的种种行为,既不能被称为高风亮节的前朝遗民,也不能被称为当朝良臣。因为在明亡之后,吕留良并没有像先贤伯夷、叔齐那样绝食以死明志,反而是做了清朝的贡生,吃了大清的皇粮。但作为贡生,却没能完成忠君之事,反而在著作中四处诽谤朝廷、蛊惑百姓。所以吕留良是个与钱谦益一般的首鼠两端的小人,“歿罹阴谴”完全是罪有应得。纪昀的看法与雍正帝在《诏谕》里对吕留良下的定罪判书的口吻极其相似,甚至可以说纪昀下笔时的动机和思路与清廷主流观点一脉相承:

留良之罪,在明亡以后,既不能首阳一饿,追迹夷齐;又不能敢影逃名,鸿冥世外,如真山民之比。乃青衿应试,身列胶庠,其子葆中,亦高擢科名,以第二人入翰苑。则久食周粟,断不能自比殷顽。何得肆作谤书,荧惑黔首?诡托于桀犬之吠尧,是首鼠两端,进退无据,实狡黠反覆之尤。核其生平,实与钱谦益相等,歿罹阴谴,自必由斯。<sup>[3]456</sup>

但袁枚在《子不语》里,与当时清廷对吕留良的主流看法有较大差异。袁枚假借一个能入地府的萧姓道士之口,预言吕晚村死后有剖棺戮尸之祸,夜叉牵着留良的铁链上写道“时文鬼吕留良,圣学不明,谤佛太过”,显示着似乎地府里面对吕留良的定罪便是“圣学不明,谤佛太过”<sup>[4]</sup>。袁枚在用这个故事暗示吕留良真正过错之处是“谤佛”,在袁枚所处的时代,如果只是用“谤佛”之言来应对吕留良的大罪,是否太过于轻慢?毕竟雍正帝在《诏谕》里面可是对吕留良的宗教倾向只字未提,反而是列举了数条吕留良祸乱朝纲的极大恶行。因此,袁枚对吕留良的看法与雍正的定论截然不同。

那么,袁枚是否在以这篇志怪笔记作品来帮助掩饰吕留良的反清言行呢?袁枚与清廷不同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暗含了他本人的深层思想。从文学本位出发,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吕留良诗文集与时文点评,挖掘袁枚《子不语》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作品在建构吕留良文学形象背后出现差异的原因,并不同程度上展现文学作品对历史事件的再创作、再解读。

## 二、吕留良文学形象差异性的原因

### (一)间接原因:纪昀“法严考辨”与袁枚“性灵自由”的对立

纪昀学宗汉儒,博览群书,工诗及骈文,尤长于考证训诂,其晚年的文学创作也偏于考辨风格。其《阅微草堂笔记》被誉为清代三大志怪小说之一,在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鲁迅先生给了《阅微草堂笔记》很高的评价:“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隼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sup>[2]138</sup>

在当时文学界号称“南袁北纪”的两人之间存在一定的文本交流。纪昀作为一位法严考辨的文宗泰斗,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姑妄听之四》里对袁枚在《子不语》中所提及的吕氏“谤佛太过”作出回应,他不认同袁枚在《子不语》里对吕留良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反驳意见。

纪昀认为,吕留良辟佛是以“尊朱之故,不得不辟陆王为禅,既已辟禅,自不得不牵连辟佛”,并非其本志,所以也不能算是他

的本罪。随后,纪昀的论证里面又包含了两个要点,其一是“金人入梦”<sup>[1]</sup>以来,“辟佛者多,辟佛太过者亦多”,如果这样便治吕留良的罪,肯定是不妥当的,这绝不是他的本罪。所以,要点其二便是通过引用五台僧之语“辟佛之说,宋儒深而昌黎浅,宋儒精而昌黎粗,然而披缁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衍昌黎不衍宋儒也”<sup>[3]457</sup>来说明昌黎所辟之佛乃“供养之佛”,就像“用兵者,先断粮道,不攻自溃也”,是真切地影响到了僧人的切身利益,断了他们的佛家香火。而宋儒所辟之佛仅仅是“明心见性之佛”,这种学理上的空谈对佛法传播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吕留良辟佛就好比宋儒辟佛一般,仅仅只是“空谈”,“于释氏毫无所加损,徒喧哄耳”。所以纪昀认为,吕留良的辟佛之说与他死后的遭遇没有任何干系:“录以为功,固为党论,录以为罪,亦未免重视留良耳。”<sup>[3]457</sup>上述两点,分析可谓丝丝入扣、鞭辟入里,在逻辑上可谓是找不到任何可以让人攻讦的漏洞。纪昀在文学创作上的考辨之风,由此可以看出来一斑。

而袁枚与吕留良同为浙江人士,后来隐居小仓山随园,他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具有江南诗性文化的特质。袁枚写诗主张“性灵说”<sup>[2]</sup>,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sup>[5]</sup>。因而,袁枚推崇文学应有个性特色,抒发真实性灵,反对一味因袭古人、宗唐宗宋而流于空套。张少康先生曾指出,袁枚提倡“性灵”,并且把“性灵”理解为“性情”的同义语。<sup>[6]</sup>也即是说,袁枚对“性灵”并未作出明确的定义,这看似随意对“性灵”一词造成的模糊化,也从某种程度上暗合了袁枚本人率意随性的自由精神。

袁枚的诗歌创作由于“性灵”的影响,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与个人性情,笔法朴实无华,几近白描。若有用典,则自然妥帖,富含情趣,较之公安派、竟陵派的“性灵说”更加深入而具体,其代表作《子不语》亦是如此。可以说,《子不语》是袁枚“性灵说”的形象化的再现,《子不语》在文字狱背景下,对于每个个体的自由与性情的标举与张扬,是袁枚性灵文学主张的一个有力侧证。<sup>[7]</sup>因此,《子不语》里的吕留良文学形象塑造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涉及的截然不同,袁枚对于“性灵说”的文学主张,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间接原因。

《子不语》这部作品亦是江南诗性自由精神的展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江南百姓就崇尚武力,这就铸造了江南人民一种豪迈张扬的性格。在经历了魏晋隋唐的文化转折后,这种个性虽隐藏潜伏,但却不曾消失。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则为强调情感的抒发以及对于主体生命自由的向往。这种江南诗性自由精神典型地体现在袁枚的《子不语》之中。从命名上来看,《子不语》就体现了袁枚的率意恣肆之笔法。圣人言“子不语怪力乱神”,而袁枚的《子不语》却记叙“怪力乱神”之事,是对正统文化观念的一种挑战。所以,在《子不语》卷二十四《时文鬼》里面,袁枚敢于假借一位萧道士之口讲述一个关于吕留良在地府阴司定罪“谤佛太过”的故事:

淮安程风衣,好道术,四方术士咸集其门。有萧道士琬,号韶阳,年九十余,能游神地府。雍正三年,风衣宴客于晚甘园,萧在席间醉睡去,少顷醒,喟曰:“吕晚村死久矣乃有祸,大奇。”人惊问,曰:“吾适游地府间,见夜叉牵一老书生过,铁锁银铛,标曰:‘时文鬼吕留良,圣学不明,谤佛太过。’异哉!”时坐间诸客皆诵时文,习《四书》讲义,素服吕者,闻之不信,且有不平之色。未几,曾静事发,吕果剖棺戮尸。今萧犹存,严冬友秀才与同寓转运卢雅雨署中,亲见其醉后伸一手指,令有力者以利刃割之,了无所伤。<sup>[4]516</sup>

姑且不论袁枚是否想要以“谤佛太过”来以退为进地在民间帮助留良洗脱其真实罪名,他试图挑战官方权威正史的文学再创造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袁枚的江南诗性自由精神,已经深深烙印在其灵魂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与其在文学创作上主张的“性灵”之说,亦是相互印证的。另外还需一提的是,袁枚带有反叛性质的“性灵说”,与他骨子里的南方属性似乎是一脉相承。而与祖籍浙江慈溪的袁枚相比,来自浙江桐乡的吕留良身上也同样流着江南自由反叛精神的血液。袁枚主要活跃于乾隆时期,此时虽然清朝当局的民族政策在前两朝的风声鹤唳之后逐渐趋于安定,但曾静、吕留良案的余音仍绕梁不绝,袁枚在《子不语》里假借萧道士之口想象吕氏在阴间的生活就是明证,这至少从侧面说明袁枚对吕留良其人、其文有相当的了解。在吕留良留下的诗文集,有两首诗凸显了吕氏的反清意识。一是《人日同黄九烟饮》里的前两联:“鸡狗猪羊马复牛,排来件件压人头。此曹更以儒为贱,吾道原无食可谋。”<sup>[8]</sup>二是《钱墓松歌》<sup>[3]</sup>,其中的“正气长争日月光,奇才饱得冰霜力”与“阴霾毒瘴不敢入,穷崖自闭苍琅根”<sup>[8]37</sup>两联形成对照关系,前两句的“日月光”暗示“明”,隐喻了吕氏为光复明王朝而斗争的决心。后两句的“苍琅”

为青色,暗指“清”,诗句原意为险要的山崖使青根自己停止生长,寄托了吕氏盼望着清朝不日会自取灭亡。后半部分有几句诗的反清意识则更为明显,“万苍不止三百多,只合题名洪武后。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君不见三代不复千余载,汉高唐太犹虚悬。不妨架漏如许日,何况短景穹庐天”<sup>[8]38</sup>。这几句表面说的是元朝蒙古的统治“天荒地塌”,实则影射清朝满族统治的日子也不会太久,用漏壶就能计算得清,会像元朝那样短暂灭亡。松枝的傲骨峥嵘仿佛也融进了吕留良不屈的江南血液里,这生生不息的南方血脉,在乾隆时期的袁枚身上也能看见依稀的傲骨传承,与袁枚的“性灵说”一道,同流淌着北方血液的纪昀形成南北对立的差异。

因此,对于《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里的吕留良文学形象存在的差异,纪昀“法严考辨”与袁枚“性灵自由”的对立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间接原因。

## (二)直接原因:纪昀奉君于朝与袁枚夷旷在野的差异

纪昀本身在清廷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站在朝廷的对立面。纪昀奉君于朝,是造成《阅微草堂笔记》里面的吕留良形象与雍正《大义觉迷录》里的判词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直接原因。纪昀在朝廷位高权重,亦是一代文宗。纪昀一直是清廷官方学术工作的领导人,凡有编辑修书之事,他都会参与。作为当朝位高权重的纪大学士,纪昀在文学创作上是清廷保持对外形象的最佳载体。他遵从晋宋的传统理念:“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sup>[31]</sup>,在创作中时时彰显着作为清廷官员的自觉,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文中,也同样深深地烙印在他的笔记小说中。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虽自称仅仅是为了“聊以遣日”<sup>[31]</sup>,但其行文风格却立法甚严、尚质黜华,非常注重考辨。而且,他的政治立场也决定了他决不可能仅仅为了“聊以遣日”而进行创作。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如是我闻卷四》借董曲江之口,表达了对吕留良的真实看法:“凡罪应戮尸者,虽葬多年,尸不朽。吕留良……开其棺,貌如生,刃之尚有微血。盖鬼神留使伏诛也。……目击之。”<sup>[3]224</sup>从“盖鬼神留使伏诛也”可以看出,纪昀此番着笔意味着假借鬼神之说来阐明吕氏的罪大恶极,而鬼神之说为表,清廷之责为里。

在吕留良看来,历朝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异邦夷狄逐鹿称霸中原的根本祸源。自秦汉一统以后,天下间只有一个君主,在不断的分分合合乃至改朝换代之后,国家甚至沦于异邦手中,这是吕留良最为气愤担忧的一点。吕留良在其诗文集与讲义中大量暗示了他关于“夷夏之防”的民族主义思想。尽管吕留良提及的时候都说得非常隐晦,但在当时的清廷掌权者看来,这些文字都敏感地触及到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统治的根基。吕留良在讲义中曾提到:“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大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sup>[9]</sup>雍正年间的曾静对吕氏的这段微妙的话语理解得入木三分,他在《知新录》里说:“管仲忘君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sup>[10]</sup>有关“华夷之辨”的议题,是吕留良在《四书讲义》中埋下的一颗关于汉族民族气节的火种,这火种燃烧到雍正年间的曾静等人身上时,以星火燎原之势突然爆发出来,让雍正得以注意并“出奇料理”。

纪昀在文学创作上是清廷保持对外形象的最佳载体,也就是说,纪昀背后代表的是与清廷相同的中央式集权的政治立场。吕留良著述中所涵盖的华夷之防以及支持诸侯分封的思想与纪昀背后所代表的中央集权政体呈现出完全悖离的趋势。

吕氏的民族政治立场与纪昀作为清廷代言人所站的立场完全不同。如果说吕留良理想的政治体制是地方分权的诸侯封建制,但清政府大一统中央集权式王朝的体制已不断完善;如果说吕留良心中的华夷之分仍大于君臣之伦,但清政府的主流民族政策则是偏怀柔的满蒙一体与满汉一家。不管是看政治体制还是民族意识,吕留良与清廷都站在了同一天平的两个极端上面。因此,位居清政府权力中心的纪昀会在其作品中对吕留良进行抨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文学成就上与纪昀并称的袁枚,在政治前途上却与纪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因为袁枚个性突出且不善左右逢源,官运一直受到阻隔,升迁困难。袁枚年四十即辞官,隐居小仓山,便从事诗文著述,广交四方文士,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悠游自在的生活。

由于袁枚处于在野的状态,他后期的作品奔放不羁,不拘成法,呈现出一种张扬的个性,是清朝士大夫阶层觉醒的体现。袁枚用他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对自然的讴歌、对生活的感悟以及对社会的真实理解,合乎性灵,关乎性情。他的无所顾忌,完完全全忠实于个人主观的写作,争取个体价值,在当时“文字狱”背景下可谓独树一帜。

袁枚在《子不语》中提到吕留良案件时,不像纪昀那样理性地把自己放置其中作为论述主体,《时文鬼》里通篇只有三个主要人物:程风衣、萧道士与吕留良,其中萧道士是整个叙述的发出者,讨论的中心人物是吕留良。而程风衣与萧道士二人的形象介于虚实之间。这二人的生平经历已无从考证,袁枚似乎有意地模糊了整个故事的背景,让整个故事孕育在扑朔迷离、似是而非的玄妙境地,将对吕留良案件的更多思考留待后人评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故事里萧道士在阴司看见的“圣学不明,谤佛太过”的锁链似乎只是一个隐喻,它打破了清政府官方对吕留良所做的盖棺定论的链条,却又以退为进地加上了一个“辟佛”的新链条,抛砖引玉般地留给后人去打破。

袁枚这样夷旷在野、追求性灵的士人精神,与大清的皇权话语由此构成了二元对立的张力状态。吕留良在《子不语》中的形象,与清廷主流建立的形象截然不同,袁枚的夷旷在野也当是差异性的直接原因。袁枚在《子不语》中实现了作为主体的个人在精神上的一种超越,完美地表现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士人心志。

### 三、政治面纱下的话语权衡与立场分裂

关于“夷夏之辨”的议题历来是中国传统士人一个绕不过去的心结,尤其是当易代鼎革被异族取代后,此番黍离之悲更是格外煎熬。明清之际,中国儒生遭遇了更大的困境。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来自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族铁骑以一个外来民族的身份一统中原,江浙大儒吕留良以“华夷之防大于君臣之义”的政治思想代表了明代遗民对于“异邦夷狄”一统天下的反对立场。

清朝末期,在内忧外患之下,不少文人有末路遗民之感,出于“吕留良情结”,对吕留良案结局有了自己的理解,比如姚永朴、章太炎等学者开始以吕留良、黄宗羲的名号重振大旗,清廷不得不对所掌控的话语权作出一定的让步。至此,清代学者、士人将吕留良言论标榜为对抗独裁势力的公议,使吕留良名声从文字狱案犯转为道德知音之先驱。

吕留良作为雍乾时期文字狱的重要个案,其形象差异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变化,不仅展现了当时清廷统治下满汉民族关系战略的演变轨迹,也暗示了清廷皇权主流意识与士人话语权力的博弈过程。这一过程,显示了在朝集团与在野之士之间的张力。如果说《子不语》中袁枚是为士人群体发声,那么,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是为皇权话语正名,吕留良文学形象的分裂,代表了两人立场的根本不同。

#### 参考文献:

[1]雍正. 诏谕[M]//《清雍正》浙江通志:首卷二. 北京:中华书局, 2001.

[2]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3]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4]袁枚. 时文鬼[M]//子不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516.

[5]袁枚. 随园诗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146.

[6]张少康.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345.

---

[7]王殿明. 袁枚性灵说的形象化再现——《子不语》[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2):64-67.

[8]吕留良. 吕晚村诗[M/OL]. 清御儿吕氏钞本. 上海:上海图书馆, 2005:11. [2019-02-16]. <http://dh.ersjk.com/>.

[9]吕留良. 四书讲义:卷十七论语十四[M/OL]. 清康熙天盖楼刻本. 武汉:湖北省图书馆, 2005:160. [2019-02-16]. <http://dh.ersjk.com/>.

[10]雍正. 大义觉迷录[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9:116.

#### 注释:

1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卞僧慧《关于吕留良的几个问题的剖析》(《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王俊义《雍正对曾静、吕留良案的“出奇料理”与吕留良研究——兼论文字狱对清代思想文化发展之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2期)、李淑清《吕留良后裔在北疆的活动及贡献》(《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张泓《清代笔记小说对文字狱的述载——以〈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吕留良案为例》(《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施婧娴《清代雍、乾时期“吕留良案”新探——以吕留良时文选评为考察中心》(《理论界》2013年11期)、张天杰《吕留良时文评选中的遗民心态与朱子学思想——以〈四书讲义〉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1)金人入梦:金人指佛。汉明帝永平七年(64)正月十五元宵之夜,汉明帝刘庄梦见一个金人从西方而来,大臣傅毅认为这是西方的佛。于是汉明帝派人赴天竺求佛法,最后使臣以白马驮经归来,即“金人入梦,白马驮经”。汉明帝遣使求佛,标志着佛教的传入得到官方的认可。见《后汉书·西域传》等。

3(2)袁枚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清代乾嘉性灵派三大家,袁枚的“性灵说”是对明代以公安派袁宏道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4(3)吕留良曾于康熙八年至二十一年间三次偕桐乡张履祥、吴江王寅旭、海宁许大辛、嘉兴巢湍民、澈浦吴汝典等遗民,应钱汝霖之邀来钱墓南北湖盘桓。他们曾想利用南北湖群山环抱、谭仙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起兵抗清。结果因清兵长驱直入,南明政权陷入内乱,最后未成事。他们在驻“湖天海月楼”期间,吟啸于钱墓松林间,有反清复明的诗歌数十首,其中以吕留良的《钱墓松歌》最为著名。